

清廉感知如何增强获得感？*

——政府回应的中介作用及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南 日 陈虹璇

(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 211815)

摘 要:为探讨清廉感知、政府回应、公民获得感的关系以及数字政府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线上线下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 1137 份有效问卷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2)政府回应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政府回应的内部系统比外部压力的中介效应更大;(3)数字政府在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中国在廉政建设中不断增强公民获得感的潜力发挥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反腐败;公民获得感;政府回应;数字政府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5)02-0136-07

1 引言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习近平, 2022),是一场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为新征程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重要着力点(习近平, 2024)。这事实上标志着反腐败清廉建设中提增公民获得感已由初步探索阶段迈向实践建设阶段,新阶段反腐清廉中增强公民获得感势必对理论话语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中央及各级政府反腐败清廉和提升公民获得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方面,中国廉政建设进入新的高潮,通过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强化纪律刚性约束、践行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持续完善反腐败斗争的机制和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常态化管理,坚定不移“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清廉工作在总体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等政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获得感维持在较高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廉政建设以及公民获得感提升取得新成效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检验提供了极佳的分析样本。然而,现有研究针对反腐清廉中提升获得感何以有效的问题提出了多种分析和检验,但这些研究大多拘囿于宏观和结构层面,忽视了对其中具体作用机制及其适用条件的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突破现有研究的范围,从影响路径

层面探讨问题。

公民获得感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心理构念。获得感一直以来是极其美好的词汇,无论是用来抒发对往日的眷恋,还是对今昔的确定,抑或是对将来的期盼,总是传递着一种憧憬、爱慕、公平的心理体验。反腐败作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政治斗争,既是事关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促进公平正义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的前提条件。但整理公民获得感的分析逻辑,显然不能只是徘徊在就公民谈公民的个体层面,而是需要将其上升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从更宏观、全局、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同频共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石力, 2022)。纵观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发展历程,公民清廉感知是检视政府行政职能成效的重要标尺,也是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提升获得感的润滑剂。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的信任和认可,公民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期待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维护和增进公民的获得利益。然而,委托人缺乏充足条件难以时刻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从而滋生腐败行为进一步影响公民清廉感知水平。可见问题的关键在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CMZ032)。

通信作者:南日, E-mail: 270363@nau.edu.cn。

于,如何让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毋庸置疑,中国反腐败斗争战略与增强获得感目标之间具有紧密协同关联,充分发挥两者协同性,将有助于更好、更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公民清廉感知越强,意味着反腐主流价值观念深入人心(Theobald et al., 2008),有利于通过沉浸式体验培养廉洁情感共鸣,营造公平正义场域,其影响无疑是格外积极的。在清廉感知氛围十分浓重的群体中,多数成员容易产生善于斗争、勇挑重担的决心,发展出砥砺品格操守、服务社会公平的担当作为,从而容易表现出较高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在不断的堵漏洞、打好仗确保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过程中增强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清廉感知能够增强公民获得感,并且有正向预测作用。

清廉感知可以看作是影响居民廉洁价值意识的晴雨表(Denisova - Schmidt et al., 2016),它为其判断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参考。当清廉感知水平较高时,意味着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危害百姓生活的“隐身衣”、“保护罩”得到了有力遏制和有效消除,高压惩腐力量常在,并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政府回应。相关研究表明,政府回应被认定为是外部控制和内部系统的共同产物(Meier et al., 2006)。从外部控制来讲,卡拉汉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反腐败力度、外部平台压力和曝光涉腐信息都对政府回应行为具有显著影响(Yang et al., 2007)。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出发,一个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公民的清廉感知水平较低,基于参与反腐可能面临的危险或者是“搭便车”可能获得的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公众参与反腐的可能性更低(Bauhr et al., 2016)。公民清廉感知之所以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历了“清廉感知 - 参与反腐 - 涉腐信息 - 舆论焦点 - 政府回应”的流程(Paek et al., 2019)。从政府组织内部而言,公民清廉感知水平的提高表明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助于强化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进一步提升政府内部系统的回应性。在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的关系分析中,一些研究认为公民清廉感知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更高的来自外部压力的政府回应,并有助于提高公民获得感(南日, 2024)。与外部“有效市场”相比,公民参与互动与内部系统维稳、反腐等一系列政府回应会更为有效地提升获得感的拥有水平。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清廉感知水平较高的公众,越有可能认为积极参与反腐行动可以影响政

府决策并感知到政府具有很强的响应力,进而期待获得更好的福利和保障(Nam, 2018)。由此可见,清廉感知会通过政府回应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并进而影响公民的获得感。整合以上的讨论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a:来自外部压力的政府回应能够在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假设2b:来自内部系统的政府回应能够在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在政府与居民互动关系中,居民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政府及时回应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字化平台建设状况的影响(Mcguire et al., 2010)。尤其是,在网络公共领域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互动最为频繁,并且折射的“民主话语”有效消解了单向的信息输出话语权威,提供了天然的利益诉求表达通道。数字政府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变革中强调数字赋能更好地实现政府治理优化。相关研究者认为,数字政府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政府与居民的良性互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改善服务体验(戴长征, 鲍静, 2017)。如前所述,清廉感知较低的人社会公平体验感也较差,并将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保障。例如,当公民感知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清廉感知较高者更愿意相信政府及相关单位,提出诉求与沟通询问的意图更强,从而在此过程中消极面得到有效缩减(Binder et al., 2013)。高水平的数字政府意味着政民互动的价值得到了切实维护,为居民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现实数字化场域。高水平的数字政府为政府与居民提供了有效沟通渠道,彼此都持有积极的憧憬,情感上的信赖所激发的关切眷恋,更可能会引导政府善治与公民更多的获得感体验。相反,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低时,清廉感知氛围淡薄的个体间彼此缺乏信任,他们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对信息闭塞的环境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以达到保护自身权益的目的。这不仅会降低效率甚至会增加产生冲突的可能,从而影响个体的获得感体验。由此提出研究假设3:数字政府能够在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起调节作用。综合上述分析假设,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为避免混淆变量和不相关因素干扰的影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向J省发放线上线下问卷1500份,回收1369份问卷,其中剔除回答时常小于1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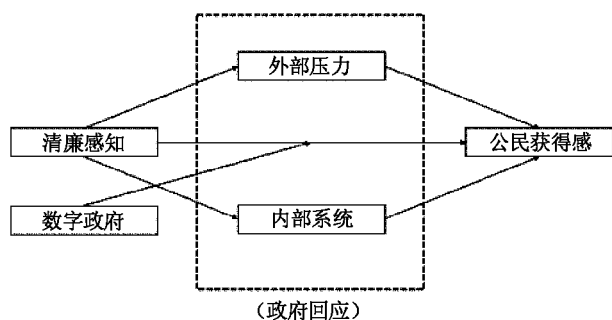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

钟或作答不完整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1137 份。其中,男性为 595 人(52%),女性为 542 人(48%);中专及以下学历为 488 人(43%),大专学历 295 人(26%),本科学历 251 人(22%),硕士及以上学历 103 人(9%);所有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 18~6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3.28 岁($SD = 1.35$)。此外,政治面貌方面,435 人(38%)为中共党员,176 人(16%)为共青团员,526 人(46%)为群众。

2.2 研究工具

2.2.1 公民获得感

采用阳义南(2022)编制的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量表测量被试获得感水平。该量表从便利性、普惠性、均等性和充足性 4 个维度,具体通过未来信心程度、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均衡程度,采用 7 点计分,分值越高代表水平或程度越高。在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7。

2.2.2 清廉感知

选取倪星等人(2021)修订的清廉感知问卷,划分为腐败容忍度、反腐工作满意度和腐败指数 3 个维度。如“根据礼金请托处理业务”、“行政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女寻找工作”。量表采用 7 点计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符合程度越低。在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7。

2.2.3 政府回应

采用迈耶等人(2006)提出的维度划分体系,将政府回应从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两个维度切入,涉及中央反腐力度、地方领导支持度、网络平台压力、个人信息源压力、涉腐信息曝光压力、官员影响力、政府透明和政府责任。量表采用 7 点计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程度越高。在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6。

2.2.4 数字政府

采用马亮(2022)测量的思路,从网络服务、电子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三个维度,共计 10 个项目。量表采用 7 点计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程度越好。在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1。

2.3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由受过专门培训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在施测前征得被试知情同意,过程中采用匿名线上线下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所有调查程序符合科学研究的伦理要求。数据处理使用 SPSS 24.0 及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程序进行分析和整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为排除共同方法偏差效应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检验(汤丹丹,温忠麟,2020)。结果显示,共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 15 个主成分因子,累积解释率为 85.62%。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为 30.34%(小于 40%),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平均方差提取值、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公民获得感、清廉感知、外部压力与内部系统、数字政府之间的两两相关均显著。

表1 相关系数与平均方差提取值

变量	标准差	平均值	获得感	清廉感知	外部压力	内部系统	数字政府
获得感	1.07	4.70	0.865				
清廉感知	0.88	4.72	0.760*	0.927			
外部压力	1.02	4.81	0.762*	0.716*	0.849		
内部系统	1.14	4.57	0.741*	0.720*	0.716*	0.869	
数字政府	0.94	4.65	0.728*	0.825*	0.675*	0.620*	0.895

注:对角线下方的数字为相关系数,*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平均方差提取值的平方根。

3.3 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政府回应的中介效应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以清廉感知为自变量,来自外部压力与内部系统的政府回应为中介变量,公民获得感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模型检验(见表 2)。模型

的拟合指标良好 $[\chi^2/df = 1.911, CFI = 0.948, GFI = 0.878, RMSEA = 0.07, NNFI = 0.898]$ 。研究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预测作用显著($\beta = 0.198, p < 0.05$);清廉感知对政府回应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15($p < 0.001$)和 0.846($p <$

0.001),说明清廉感知对政府回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回应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对公民获得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240($p < 0.05$)和 0.549($p < 0.001$),这表明政府回应对公民获得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表 2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β	p -value	对应假设	分析结果
清廉感知	公民获得感	0.198	0.018	H1	成立
清廉感知	外部压力	0.815	0.000	H2a	成立
外部压力	公民获得感	0.240	0.013	H2a	成立
清廉感知	内部系统	0.846	0.000	H2b	成立
内部系统	公民获得感	0.549	0.000	H2b	成立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结构方程模型中的两种中介路径进行测算分析。表 3 报告了政府回应对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模型的 R^2 为 0.7142, F 值为 75.790,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

表 3 政府回应对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R-square	Adjusted R-square	p-value	F-value
0.7142	0.7047	0.000	75.790

表 4 报告了清廉感知、政府回应、公民获得感的直接效应。采用自举法(bootstrap)对存在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研究加载 Process 插件和命令,采用 bootstrap 自抽样 5000 次,设定 95% 的置信区间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评估清廉感知、政府回应和公民获得感的间接影响,采用 Bias Corrected 偏差校正法估计的总体效应标准化估计的下限值、上限值检验。结果显示,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发挥的间接效应区间为 $[0.395, 0.696]$,不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此外,清廉感知通过政府回应的外部压力 $[0.088, 0.343]$ 和内部系统 $[0.181, 0.471]$ 为中介显著影响公民获得感,假设 2a 和假设 2b 得到验证。

表 4 清廉感知、政府回应、公民获得感的直接效应

区分	清廉感知→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公民获得感	
	Coefficient	p-value	Coefficient	p-value
外部压力	0.9237	0.000	0.2353	0.000
内部系统	0.8351	0.000	0.3915	0.000

表 5 报告了政府回应区分为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两个方面检验中介效应的结果。结果显示,内部系统($\beta = 0.389, p = 0.000$)比外部压力($\beta = 0.352, p = 0.000$)中介效应更大。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证实

了政府回应的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在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关系间的间接影响。

表 5 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结果(95% confidence intervals)

	Upper	Lower
Total	0.696	0.395
外部压力	0.343	0.088
内部系统	0.471	0.181

3.4 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根据库夫特罗斯(Koufteros)推荐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把调节变量数字政府分为高、低两个集团,逐步对模型进行检验(Koufteros et al., 2006)。模型 1 的 $\chi^2 = 445$,模型 2 的 $\chi^2 = 462$,两者之差为 17,统计上并不显著。模型 3 的 $\chi^2 = 478$,与模型 2 之差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模型 4 和模型 3 的 χ^2 之差统计上显著。鉴于此,可以判断数字政府的高低两个集团之间在路径系数上存在显著差异。模型 5、模型 6 和模型 7 分别与模型 3 进行对比后,发现只有模型 7 与模型 3 的 χ^2 之差大于 3.84,在 0.01 水平上显著。即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越高,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的效果,研究采用 Aiken 和 West 提出的简单斜率分析方法(Aiken & West, 1991),将数字政府按平均分上下各一个标准差后区分为高低两组,根据回归方程分析在不同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下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作用,如图 2 所示。在低水平的数字政府建设情况下,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为正相关,但在高数字政府水平时,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作用更强,再次验证了假设 3。

表 6 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检验

Model comparisons	χ^2	df	χ^2/df	$\Delta\chi^2$	Δdf	NFI	CFI	显著水平
模型 1: base model	445.3	260	1.713			0.78	0.89	
模型 2: equal loadings	462.3	271	1.706	17.1	11	0.76	0.88	5%
模型 3: equal loadings, measurement error	478.5	286	1.673	16.2	15	0.75	0.88	5%
模型 4: equal loadings, measurement error, structural coefficients	498.7	294	1.696	20.2	8	0.74	0.87	1%
模型 5: 清廉感知→内部系统	478.5	287	1.667	0.0	1	0.75	0.88	5%
模型 6: 清廉感知→外部压力	482.3	287	1.681	3.8	1	0.75	0.88	5%
模型 7: 清廉感知→获得感	487.9	287	1.700	9.4	1	0.74	0.8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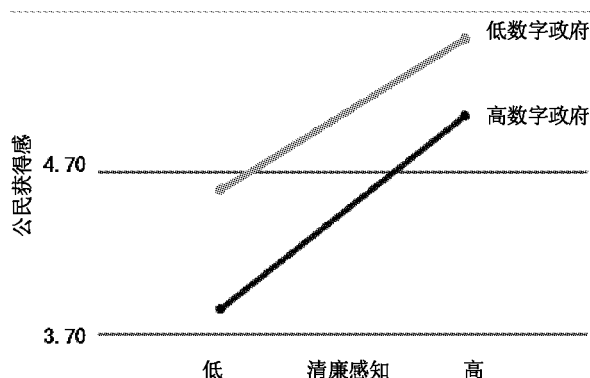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政府在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的调节效果

4 讨论

研究通过对公民获得感的调查,证实了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政府回应的中介作用和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反腐清廉中提升获得感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4.1 反腐清廉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

研究表明,清廉感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公民获得感,假设 1 得到验证。获得感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要义,饱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腐正风行动中带来更多获得感着眼于国家治理与公民感知的自然耦合,有助于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一方面,反腐清廉与获得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的将“国家中心主义”(Johnston, 1998)和“社会中心主义”(Mol, 2007)两种大相径庭的研究范式衔接整合起来,进而为推进社会反腐、提高清廉感知提供了理论话语,也为后续公民积极参与反腐行动提供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反腐正风过程中补齐短板、完善机制明晰反腐遵循理论创新价值,成为中国履行国际责任、推广中国方案的目标遵循和价值取向。清廉感知较高的个体对政府工作主观评价、社会公平正义环境、未来生活期盼憧憬抱持较为正面积极的解读和期盼,在政治上信任党、经济上奔

小康、心理上稳健康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获得感。

4.2 政府回应的中介作用

清廉感知通过来自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系统的政府回应的中介作用对公民获得感产生影响,假设 2 得到验证。政府回应是政府对公民诉求及时有效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过程。政府回应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政府内部系统中自上而下的问责压力(邵梓捷,杨良伟,2022),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伦理责任等外部舆论压力(张则行,2015)。虽然它是被动的反应,但是对公民个体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依据政治系统理论,政府回应实质上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互动关系(Gauld et al., 2009),在此过程中对个体产生“获得效应”。获得效应的核心是“投入-产出-感知”链条,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个体渴望享受国家福利。国家的公民对社会福利有着强烈的预期,清廉政府更有可能对此敢于担当直面矛盾,从政府内部系统自上而下顺应潮流。这即是来自于系统内部的政府回应。在精神方面,个体渴望获得他人认同。廉洁清官是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容易形成群体言论认同聚焦效应。舆论导向及人民监督是政府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力量来源,它也就是来自于外部压力的政府回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清廉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可以通过及时且有效的政府互动沟通提高政府信任水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从而有效影响获得感。

除此之外,通过研究发现来自于内部系统的政府回应比来自于外部压力的政府回应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考虑到实现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根本条件就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资源配置和实施推进(南日,2024)。从根本上说,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是公民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安全感更有保障、幸福感更可持续的内在保障。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公职人员的责任意

识、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不断提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回应机制,不断通过公开回应内容、回应程序和回应标准,创造了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加生动、鲜活,富有活力的社会。对于公民个体而言,享有广泛且规范的监督权力的同时,一个值得信任、挺膺担当的党和政府不断提出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有助于公民产生更大的获得感。

4.3 数字政府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在清廉感知和公民获得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越高,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更大,假设3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当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高时,数字化场域无疑为居民正面解读“打虎”、“猎狐”、“拍蝇”提供了引导途经,以积极的心态认同与内化惩戒的腐败案件,从而感知政府祛痼治乱的信心与决心,体验更多更高的获得感。反之,当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较低时,个体对政府意图和行为容易产生消极或怀疑情绪,且随着这种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容易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消极效应影响获得感的体验。该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说明不管公民个体处于社会权力与资源版图的核心还是边缘地带,只要拥有较高水平的数字化政府,也就代表拥有了一个人人尽责、人人有责的治理环境,因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感知差异的漂移现象,进而防止其在认知和价值观方面产生严重扭曲,最终影响其获得感。这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在公民群体内有效性的理解。

4.4 研究局限和展望

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补充和拓展。首先,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所获得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在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和内生性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其次,囿于研究者精力,研究调查仅在J省份开展,无法提供更多地区有关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影响数据;再者,模型中未能控制所有的重要变量,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上述不足之处,有待于通过后续研究不断完善和深化。

5 结论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清廉感知显著正向预测公民获得感;(2)政府回应清廉感知与公民获得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且来自内部系统的政府回应比来自外部压力的政府回应中介效用更大;(3)数字政府会调节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政府

数字化建设水平越高,清廉感知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越大。

参考文献

- 戴长征,鲍静.(2017).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9),21-27.
- 马亮.(2022).网上办事不求人:政府数字化转型与社会关系重塑.《电子政务》,(5),31-42.
- 南日.(2024).政策框架视角下反腐倡廉增进公众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5-69.
- 南日.(2024).政府市场共演理论视角下清廉感知对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4-43.
- 倪星,许凤显.(2021).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理论与改革》,(3),102-117,156.
- 邵梓捷,杨良伟.(2022).“钟摆式回应”:回应性不足的一种解释:基于S市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实证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114-122.
- 石力.(2022).正确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理论命题,扣好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第一粒扣子”.2022-6-6 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606/c40531-32439108.html>.
- 汤丹丹,温忠麟.(2020).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问题与建议.《心理科学》,43(1),215-223.
-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2(5),731-745.
- 习近平.(20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6-18 取自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6/18/c_1128753531.htm.
- 习近平.(2024).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4-1-8 取自 https://www.ccdi.gov.cn/toutiao/202401/t20240108_320563.html
- 阳义南.(2022).获得感、公平度与国民幸福感提升: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3),50-59.
- 张则行.(2015).政府责任重构与公共服务授权:回应型治理的一个分析架.《福建行政学院学报》,(1),29-37.
-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 Bauhr, M. (2016). Need or greed? Condi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corruption. *Governance*, 30(4), 561-581.
- Binder, A. J., & Wood, K. (2013). *Becoming right: How campuses shape young conserv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nisova – Schmidt, E. , Huber, M. , & Leontyeva, E. (2016). Do anti – corruption educational campaigns reach students? Evidence from two cities in Russia and Ukraine. *Educational Studies Moscow*, 26(1) , 61 – 83.
- Gauld, R. , Gray, A. , & McComb, S. (2009). How responsive is E –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6(1) , 69 – 74.
- Johnston, M. (1998). Fighting systematic corruption: Social found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10(1) , 85 – 104.
- Johnston, M. (1998). What can be done about entrenched corruption. In B. Pleskovic (Ed.) ,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pp. 69 – 90).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 Koufteros, X. , & Marcoulides, G. A. (2006). Product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based multi – group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03(1) , 286 – 301.
- Meguire, M. , & Silvia, C. (2010). The effect of problem severity,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and agency structure o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Evidence from loc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0(2) , 279 – 288.
- Meier, K. J. , & O’ toole, L. J. (2006). Political control versus bureaucratic values: Reframing the deb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2) , 177 – 192.
- Mol, A. (2007). Bring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back in: Partnerships in perspective. In P. Glasbergen (Ed.) , *Partnerships,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pp. 214 – 236). MA: Edward Elgar.
- Nam, T. (2018). Examining the Anti – corruption Effect of E – governmen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A Cross – country Stud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5(2) , 273 – 282.
- Paek, H. , & Hove, T. (2019).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role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in effective risk rumor management: A test case of radiation – contaminated seafood in South Korea. *Risk Analysis*, 39(12) , 2653 – 2667.
- Theobald, N. A. , & Haider – markel, D. P. (2008). Race, bureaucracy,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2) , 409 – 426.
- Yang, K. , & Callahan, K. (2007). Citizen involvement efforts and bureaucratic responsivenes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1) , 114 – 126.

How Does Integrity Perception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Government

Nan Ri Chen Hongx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integrity, government response, citizens’ sense of gai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government, a total of 113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by online and offline random sam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corruptibility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itizens’ sense of gain; (2) Government respons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integrity and citizens’ sense of gai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internal system of government respons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external pressure; (3) Digital governmen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integrity and citizens’ sense of gain.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otential of citizens’ sense of ga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government.

Key words: anti – corruption; citizen’s sense of gain; government response; digital government